

俄罗斯灵魂

[俄]尼·别尔嘉耶夫 著 石衡潭 译

一

世界大战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识问题。俄罗斯民族思想感觉到解开俄罗斯之谜、理解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任务的要求与责任。在今天世界大战的日子里,大家都感觉到俄罗斯面临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任务。虽有这种深刻的感觉,但人们同时意识到,这些任务并不明确,而且几乎无法明确。很久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预感:俄罗斯是注定为某种伟大任务而生的,俄罗斯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媲美的独特国度。俄罗斯民族思想受到了俄罗斯作为上帝选民和上帝使者感觉的滋养。这种感觉源于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古老思想,中间经过斯拉夫派传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索罗维约夫乃至现在的非斯拉夫派思想之中。许多欺骗和谎言也与这类思想纠缠在一起,但其中仍反映出了真正民族的和真正俄罗斯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是被召唤和注定作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整个一生都感到某种独特伟大的使命并在精神最高涨时期强烈地意识到它。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在整个民族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在世界生活中还没有起过决定的作用,就其现状而言,她还没进入欧洲人的生活,伟大的俄罗斯还完全处于世界和欧洲

的一个单独省区的地位,她的精神生活是孤立与封闭的。世界还完全没有认识俄罗斯,还在歪曲地接受她的形象,错误而肤浅地评判她。俄罗斯精神力量还没有成为欧洲人文化生活中的内在因素。对于西方文明人而言,俄罗斯完全是超验的、奇异的东方,她时而以其神秘而被欢迎,时而又因其野蛮而遭排斥。甚至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作为西方人所不习惯的辛辣而独特的精神食粮而为他们所迷恋。西方有很多人为俄罗斯东方的神秘深邃所吸引,但现在还远远没到承认基督教东方的精神生活与西方的精神生活平起平坐的时候。西方还感觉不到俄罗斯精神力量能规定和改造西方的精神生活,还感觉不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在西方的本体和核心之处取代西方思想,只有不多的独特者看到了来自东方的光明。俄罗斯早已被承认为伟大的强国,但作为其生活核心的精神文化(国家制度本身对它而言,还只是它的外壳和工具)还没有在世界上占据伟大强国的地位。俄罗斯精神不能使人民接受的条件,俄罗斯外交能使他们接受。斯拉夫民族在世界上,还没有占有像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所占的那种地位。这一切应该在今天的伟大战争之后得到根本改变,这场战争完全是东方人和西方人非同寻常的历史接触和交融。伟大的战争应该导致东方与西方的伟大联合,俄罗斯的创造精神最终将在精神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伟大强国的地位。那在俄罗斯精神核心中形成的东西将不再是外省的、孤立的和封闭的而将成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是西方的。对此,俄罗斯潜在的精神力量早就已经成熟了。1914年的战争将比1812年的战争更深更猛地将俄罗斯卷入世界生活的漩涡之中,并将欧洲的东方和欧洲的西方联结在一起。已经可以预见,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欧洲在何种程度上承认俄罗斯对自己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俄罗斯就会在何种程度上彻底地成为欧洲。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民族在人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

时刻正在到来,其足音已蹙然可闻。先进的日耳曼民族会在军事帝国主义中耗尽自己,西方很多敏锐的人们预感到了斯拉夫人的使命。但俄罗斯世界任务的实现不能是历史自然力量的恣意妄为,民族理性和民族意志的创造性努力是必要的。如果西方民族是非情愿地最终看到了俄罗斯的卓越面貌并承认她的使命,那么剩下的一切还并不清楚:我们自己认识俄罗斯的使命何在了吗?俄罗斯本身对于我们成了难解之谜。俄罗斯是矛盾的、二律悖反的,俄罗斯是任何学说也不能涵盖的。丘特切夫在一首关于俄罗斯的诗中说:

俄罗斯凭理智不能理解
也不能用共同的尺度来衡量;
她有着独特的性格;
对俄罗斯有的只能是信仰

可以正确地说,俄罗斯是学术、学说的任何尺度所无法衡量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信仰俄罗斯,每个人能在俄罗斯存在的充满矛盾的事实中找到对自己信仰的肯定。只要你试图去解开蕴藏在俄罗斯灵魂中的秘密,马上就会承认俄罗斯的二律悖反性,承认她可怕的矛盾。这时,俄罗斯自我意识就从谎言和虚伪的美化中解放出来,从可憎的自吹自擂中解放出来,就像从无性格的世界主义否定和国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一样。

俄罗斯存在的矛盾永远能在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思想哲学中找到自己的反映。俄罗斯的精神创造像俄罗斯历史一样分为两个方面,这在最富我们民族色彩的思想体系——斯拉夫文化中和在我们民族的伟大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身上最鲜明地体现出来。俄罗斯历史的全部反常性和悖论性在斯拉夫主义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体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面貌就像俄罗斯自身面貌一样是双重的，并且引起矛盾的感觉。不可测的深度和无限的高度与某种卑鄙的、粗俗的、与尊严的缺乏、与奴役交织在一起。对人们的无限的爱、真正基督的爱与人的依赖性和残酷性交织在一起，对基督的绝对渴望与奴隶般的服从相调和。这难道不就是俄罗斯本身吗？

俄罗斯是最无国家主义、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并且俄罗斯民族是最不问政治的民族，他们从来不善于经营自己的土地。所有真正的俄罗斯人，我们民族的作家、思想家、政论家都是无国家主义者、独特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以不同的形式为我们的极左派和极右派所固有。斯拉夫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实质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像米哈伊尔·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一样。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俄罗斯天性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唯心主义中找到了自己典型的表现。俄罗斯知识分子即使染上肤浅的实证主义思想，但在其无国家性上还是纯粹的俄罗斯人。他们身上最优秀、最英雄主义的成份在于对不适合于任何国家体制的绝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我们的民粹主义是西欧所不熟悉的俄罗斯特有现象，是无国家主义精神现象，而且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永远更易成为人道主义者而非更易成为国家主义者。谁都不想要权力，谁都害怕权力，仿佛它是不洁的。我们专制制度的东正教思想体系同样是一种无国家主义现象，它拒绝人民和社会创立国家生活。斯拉夫派意识到：他们关于君主专制的学说是一种否定国家的独特形式。任何一种国家体制都是实证论的唯理论的。俄罗斯灵魂企望的是神圣的社会生活，上帝选民的权力。俄罗斯人民的天性意识到自己是否定尘世功业和幸福的禁俗主义者。我们的左派和革命派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的分歧并不是那么大，在他们那里有更多的斯拉夫主义和禁欲主义精神。像卡特切夫和奇切林这样的国家体制思想体系，永远显得不是俄罗斯的，而是

在俄罗斯土壤里的某种外国的东西,就像国家事务中而非俄罗斯事业中的官僚主义永远显得不是俄罗斯的,而是外国的一样。召唤外来的瓦兰比亚人来管理俄罗斯土地的意味深长的传说处于俄罗斯历史的核心,因为“我们的土地辽阔却没有秩序”。这是多么符合俄罗斯人在经营土地方面致命无能而又颇为不屑的性格呀。俄罗斯人民好像想要的不是自由的国家、国家中的自由,而想要摆脱国家的自由,摆脱对尘世关注的自由。俄罗斯人民不想成为勇敢的建设者,她的天性在国家事务中显露为女性气的、消极的和驯服的,俄罗斯人民永远期待未婚夫、丈夫、主人。俄罗斯是驯服的、女性气的大地。对待国家权力关系上的消极的、被动的女性气是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历史的特点。^①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民族的忍耐是没有止境的。国家权力对于无国家主义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永远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原则,也不是从她自身中产生的,而像是外来的,就像未婚夫走向未婚妻。因此权力经常像是外来的,就像德国的领主。俄罗斯急进派和俄罗斯保守派同样认为:国家,这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很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历史中没有彰显男子汉气质的骑士精神,与此相联系的是俄罗斯生活中的个性因素不够发达。俄罗斯民族永远喜欢生活在集体圈子里,生活在大地伟力的浑融与母亲怀抱的温暖之中。骑士精神孕育着个人尊严和个人荣誉,磨砺个人的坚韧性。而俄罗斯历史则没有磨砺出这种个人的坚韧性。在俄罗斯人身上有的是意志薄弱,在俄罗斯人面庞上没有如雕似琢的轮廓。托尔斯泰的普拉东·卡塔耶夫是圆形的。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是女性气的,而非男性气质的,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即使斗士巴枯宁也陷入了混沌的俄罗斯自然力之中。俄罗斯的无国家主义不是为自己争取自由,而是贡献自己,是摆脱积极性的自

^① 这点已由俄罗斯革命所充分证明,在革命中人民的精神是消极的,并服从于新的革命暴政,但又充满了愤慨之情。——作者注

由。俄罗斯人民希望成为期待丈夫的未出嫁的土地。俄罗斯的这些特点构成斯拉夫派历史哲学和斯拉夫派社会理想的基础，但斯拉夫派的历史哲学不想了解俄罗斯的二律悖反性，他们认为俄罗斯只有一个正题。而在俄罗斯生活中存在着反题，如果其中只有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点，俄罗斯就不会如此神秘。斯拉夫派的历史哲学不能解释俄罗斯变为世界上伟大帝国之谜或其解释过分简单。斯拉夫派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俄罗斯气质的自然历史特点完全纳入基督教美德的范围。

俄罗斯是最国家主义最官僚主义的国家，在俄罗斯一切都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俄罗斯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最伟大的帝国，从伊凡·卡里特开始就逐步而顽强地集聚俄罗斯并使之达到了令世界各国人民难以想象的规模。认为人民追求内在的精神生活并非没有根据，但人民的力量献给了把一切变为自己工具的庞大国家制度。创造、维持、保护大国的利益在俄罗斯历史中占有罕见的、压倒一切的地位。俄罗斯人民几乎不存在自由生活的力量，所有的鲜血都为巩固和捍卫国家而流。阶级和阶层发展微弱并不能起到像在西方国家历史中的那种作用。个性被压抑在外强中干的国家的巨大规模之下，官僚发展到了惊人的规模。俄罗斯国家体制处于小心谨慎和防范保守的状态，它在同鞑靼人的斗争中、在混乱年代、在外族入侵中锻炼了自己。它变成了自我压抑的抽象因素，它按自己的规则，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生活，不想成为人民生活的从属现象。俄罗斯历史的这一特点给俄罗斯生活打上了缺欢少乐和逆来顺受的印记。人的创造力不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俄罗斯生活中的官僚权力是德国风尚的内在侵入。德国风尚已经有机地进入俄国国家体制之中并控制了女性气的、消极的俄罗斯自然力。俄罗斯大地没有接纳那自己命中注定的丈夫，而是嫁错了人。俄罗斯人民为创建俄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流淌了许多的鲜血，但他们

在自己广袤无垠的国家里仍处于无权状态。帝国主义一词在西方和资产阶级中的意义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却驯服地将自己的力量献给了他们心灵并不感兴趣的帝国主义,并创立事业。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灵魂的秘密就蕴藏在这里。任何一种历史哲学,无论是斯拉夫派的还是西欧派的都没能解释:为什么最无国家主义的民族创造出了如此巨大而强盛的国家体制?为什么最无政府主义的民族如此地驯服于官僚?为什么精神自由的民族仿佛不想要自由的生活?这一秘密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独特关系相联系。这种二律悖反性贯穿于一切俄罗斯存在之中。

在俄罗斯与其对自己民族性的认识关系上也存在着神秘的矛盾,这是第二种二律悖反,它的意义并不亚于对国家关系上的二律悖反。俄罗斯是世界上最非沙文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主义总是产生一种非俄罗斯的,非共同的,像德国风尚的印象。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大多数是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俄罗斯人几乎为他们是俄罗斯人而感到羞愧,民族骄傲是他们所陌生的,哎!甚至连民族自尊也是陌生的。倾向于以强力推行俄罗斯化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俄罗斯民族的固有本性。俄罗斯不显山露水,不炫耀自己,不鄙视他人。在俄罗斯人的天性中真正地具有一种西方民族所没有的民族、无私和牺牲精神。俄罗斯知识分子永远以厌恶的态度对待民族主义,视之为不洁物,但又屈从于它。他们仅仅信仰超民族的理想。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学说无论多么肤浅、多么平庸,而在其中即使以歪曲的形式,也反映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超民族的、全人类的精神。叛教知识分子在一定意义上比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更具民族性,后者表现出的面貌却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极其相似。非知识分子精神的另一代表是民族天才列夫·托尔斯泰,他是在自

己的信仰渴望中克服了任何一种民族局限性、任何一种民族肉欲重负的真正的俄罗斯人。斯拉夫派并非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力图相信，在俄罗斯人民中生存着全人类的基督教精神，他们赞扬俄罗斯人民的温顺。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宣称：俄罗斯人是全人类的人，俄罗斯精神是全人类的精神。他不是像民族主义者那样来理解俄罗斯的使命。新时期的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毫无疑问的西欧化，是俄罗斯土壤中保守的西欧派。民族主义思想家卡特科夫是西欧派，他从来不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表达者。卡特科夫是某种异己的国家体制，某种抽象原理的辩护士和奴隶。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同样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固有本性，就像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一样。俄罗斯的民族性恰恰在于她的超民族主义，在于她的摆脱民族主义的自由。俄罗斯在这点上独特的，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俄罗斯赋有各民族解放者的使命，这种使命是在她的独特精神中形成的。俄罗斯世界任务的正义性已经为历史的精神力量所注定，俄罗斯的这一使命表现于今天的战争中。俄罗斯没有自私的追求。

我们有权利表达出关于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正题，但同样的一个反题也并不缺少依据。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民族主义的国家，是民族主义盲目膨胀的国家，是一强力推行俄罗斯化并压制受支配民族的国家，是民族性自夸自大的国家，是一个认为自己具有独特使命而把整个欧洲当作注定要灭亡的恶魔和腐败恶果来加以排斥的国家。俄罗斯温顺的反面是俄罗斯异常的自高自大，最温顺的是最伟大、最强盛的，是惟一具有使命的。“俄罗斯人”是正义的、善良的、有神性的。俄罗斯是“神圣罗斯”。俄罗斯是有罪的，但在其罪中她仍然是神圣的国家，是生活在神圣理想中的圣徒的国家。索洛维约夫嘲笑了认为所有圣徒都说俄语的俄罗斯民族自高自大信念。正是那个宣扬全人类的人并呼唤全世界精神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他也宣扬最残酷的民族主义,践踏波兰人和犹太人,否定西方列属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种权利。俄罗斯民族的自高自大总是表现在:俄罗斯不仅认为自己是最基督教的,而且认为自己是惟一基督教的^①国家。天主教完全不被承认为是基督教。这也是以虚伪的态度对待波兰问题的精神根源之一。按其所赋使命的精神,俄罗斯应是各民族的解放者,但却太经常地成为了压迫者,因而她唤起了对自身的敌视和怀疑,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加以克服的。

俄罗斯历史呈现出非常独特的景观——基督教教会的充分民族化,她像定义全世界的教会一样来定义自己。教会的民族主义是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它得到了我们的旧礼仪的滋养,但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家教会中占统治地位,这种民族主义也渗透到了斯拉夫派的思想体系之中,它总是以俄罗斯的思想暗中替换全世界的思想。基督教的普世精神,男性气质的普世的逻各斯为女性气质的民族自然力所俘虏,为异教的原始性的俄罗斯大地所俘虏。这种融合性的宗教就这样在母亲大地上,在集体主义的民族自然力中,在动物及人的体温中形成。俄罗斯的信仰是女性气质的信仰,是集体的生物体温的信仰,它被体验为神秘的体温,其中个人宗教因素发展微弱,他害怕从集体的温暖中堕入水深火热的个人信仰之中。这种信仰拒绝男子汉的、积极的精神道路。这与其说是基督的宗教,不如说是圣母的宗教,是大地母亲的宗教,是照耀肉欲的日常生活的女神的宗教。罗扎洛夫就是这种俄罗斯世代相传的肉欲宗教、生殖和舒适宗教的天才表达者。大地母亲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变成了圣母,变成了含有神性的国度。这种女性气质的、民族自然力的信仰应该把责任委托给男人,他们肩起精神积极性的重担,背上十字架,成为精神的向导。俄罗斯人民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把自己委托给了圣徒、长老、丈夫,在与他们的关系上他们应该像在圣像面前一样地崇拜。俄罗斯人民甚至不敢去想:圣徒是可

以仿效的，神圣是精神的内在道路。这些是太过男性气的大胆之举。俄罗斯人民与其说想要的是神圣，不如说想要的是对神圣的景仰和崇拜，就像他们想要的不是权力，而是献身给权力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负担转交给了权力。俄罗斯人民大多数在信仰活动中是疏懒的，她的信仰是平原的，而非山岳的；集体的温顺对于她比个人信仰的锻炼、比牺牲民族自然生活的温暖舒适要容易得多。俄罗斯人民以其温顺而赢得了这种集体生活的舒适与温暖的奖赏。这就是俄罗斯教会在俄罗斯民族化的民族土壤。其中包含了宗教自然主义的巨大杂质，它产生于精神的基督教之前。基督教的爱本身是精神的存在，是与肉体 and 血缘的联系相对立的。而自然主义的宗教则是建立在这二者之上，它使爱朝向“自己的”人。这样宗教就坚固了肉欲，而不是精神，宗教的实利主义的柱石就这样受到保护。教堂耸立于广袤的俄罗斯原野之上，圣徒和长老活动于其间，但原野的土壤仍然是自然主义的，风习仍然是异教的。

弗·索洛维约夫为俄罗斯认识所完成的伟大事业，首先应看到的是他对教会民族主义的无情批判，对普世的基督精神，对把基督精神从民族自然力，从自然主义的俘虏中解放出来的永恒呼唤。诚然，弗·索洛维约夫在其反教会民族主义的行动中过分崇拜天主教，但他的核心追求和其基本精神仍是不容置疑的伟大真理并将为俄罗斯所承认。弗·索洛维约夫是抵制俄罗斯存在的民族主义反题的真正抗毒素。在解决波兰人和欧洲人问题上他的基督教真理应该永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真理相对立。教会的民族主义把教会引向了国家的奴役。教会是精神的、神秘的机体，它消极地屈从于德国主教公会的权力。俄罗斯在对待民族性上的这种神秘和二律悖反性是与她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稳定关系分不开的，是与个性的不发达和未展开分不开的。在基督形象中产生了自己大地的新郎，他是女性气质的民族自然力的仪表堂堂的丈夫，

而不是他的奴隶。

可以在俄罗斯的一切方面考察这种谜一样的二律悖反性。可以建立无数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正题与反题,揭示出俄罗斯灵魂中的诸多矛盾。俄罗斯是精神无限自由的国度,是朝圣和寻找真理的国度。俄罗斯是世界上最非资本主义的国度,在这里没有那种令俄罗斯人排斥和厌恶的市侩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他可以研究俄罗斯的灵魂,在自己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令人震撼的传说中成为基督的如此勇敢和无限自由的预言者,世界上还没有人如此决断。肯定自由是俄罗斯的性格特征,它永远是斯拉夫文化的本质特点。斯拉夫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把俄罗斯人民的内在自由,这种为其本性所固有的不向世界任何利益让步的宗教自由,同西方民族的内在不自由和他们的外在奴役对立起来。在俄罗斯人民中真正享有自由的只能是这种人,即那不过分贪婪地吞噬占有大地财富和大地设施的人。俄罗斯是日常生活自由的国度,这是被市侩主义准则所奴役的西方所不知晓的。只有在俄罗斯没有资产阶级虚伪的压制人的权力,没有市侩家庭的专制。俄罗斯人以十分轻松的精神克服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性,远离各种日常生活,远离各种标准生活。朝圣者典型对于俄罗斯是如此地合乎本性,如此地优美。朝圣者是大地上最自由的人。他行走在大地上,但他的周围是轻盈的空气,他不是扎根于大地之中,他身上没有敦实与平庸。朝圣者是摆脱了“世界”的自由人,大地和大地生活的所有重负都化作了他双肩上的小小行囊。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对崇高生活的渴望集中地体现在朝圣者典型身上。俄罗斯朝圣者典型不仅在人民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在部分优秀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我们这里所了解的朝圣者,他们具有任何力量都不能压制的自由精神,他们是寻找看不见城市的永恒旅人。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可以读到关于他们的小说。朝圣者在文明人、知识分

子的生活中有时称为大地的漂泊者,有时称为被遗弃的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中有他们,后来他们又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出现。拉斯科尔尼科夫、梅思金、斯塔夫罗金、维尔西洛夫、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别竺豪夫,所有这些人都是精神的朝圣者。朝圣者没有自己的城市,他们在寻找未来的城市。弗·索洛维约夫总感到自己不是这个大地上的居民和市民,而只是一个没有自己居所的过客和流浪汉。斯科沃罗达也是这样,他是18世纪人民中的杰出朝圣者。精神的漫游在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身上,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都存在,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身上也存在。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一种超出一切实证和可见生活的绝对生活。这种精神漫游也出现在俄罗斯的教派分裂运动中,出现在神秘的民族渴望中。这种愿望有时减弱了,那是为了精神的再度骤现。俄罗斯是精神陶醉的幻想的国度,是鞭笞派、自焚者、反正教仪式派的国家,是孔德拉季·谢利瓦洛夫和格里高里·拉斯普金的国度,是僭王和布加乔夫式暴动的国度。俄罗斯灵魂不会居于一隅,不是市侩的灵魂,不是一地的灵魂。在俄罗斯,在人民灵魂中有一种对无限的追求。对看不见的城市,看不见的居所的追求。俄罗斯灵魂面前展开的是远景,他的精神视野中没有固定的地平线。俄罗斯灵魂在对真理、对绝对的上帝的真理的追求的火焰中燃烧,在拯救整个世界和迈向新生活的共同复活的火焰中燃烧。她永远打上了人民和全世界的忧伤和苦难的印记,她的苦难没有尽头。这种灵魂为关于生活意义问题的有限的、可恶的答案所吞噬。在俄罗斯灵魂中有好斗和不驯,有对任何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东西的不满足不满意。越往前走就越应向前,走向终点,走向边界,走向这个世界的出口,一切当地的、小市民的、受压制人的世界的出口。有人不止一次地指出这点:俄罗斯的无神论本身是宗教的,知识分子的英勇情绪以唯物主义的名义走向了死亡。

如果看到这是在唯物主义批判掩盖下对绝对的追求,那么这种奇怪的矛盾就可以理解了。斯拉夫斗士是其他民族所不知晓的热情似火的自然力。巴枯宁就是这样一个强烈地渴望一场世界大火将旧的世界烧得精光的俄罗斯人、斯拉夫人、救世论者。关于俄罗斯有这样一正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连同她神秘教派、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思想、俄罗斯作家惊心动魄的命运,这些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而又在此时更具有民族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权力肯定这一命题:俄罗斯是无限自由和精神悠远的国度,是朝圣者、漂泊者和追求者的国度,是以其自然力,以其不囿于知识形式的民族狄奥尼索斯精神而躁动不安、惊心动魄的国度。

而反题是这样:俄罗斯是闻所未闻的沙文主义和彻头彻尾驯服的国度,是丧失个人权利意识和不保护个人尊严的国度,是宗教生活被国家所奴役的惰性的保守主义的国度,是浓烈的风习和沉浊的肉欲的国度。俄罗斯是耽于沉浊肉欲的商人,保守到不愿动弹的贪财者的国度,是从来不跨越封闭、死寂的官僚主义王国界限的官僚的国度,是除了土地什么也不希望而完全表面地自私地接受基督教的农民的国度,是陷入物质生活的僧侣的国度,是信奉仪式的国度,是惰性的、保守的、被肤浅的唯物主义思想污染了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国度。俄罗斯不爱美,像害怕奢华一样害怕美,不想要任何多余的东西。俄罗斯如此笨重,如此怠惰,如此懒散,如此地沉溺于宗亲的怀抱里,如此驯服地同自己的生活和解,简直让她从原地挪动一下都不可能。我们所有的阶层,我们的基本阶层:贵族、商人、农民、僧侣、官吏,全都不想也不爱登高,全都喜欢呆在低地,呆在平原,与“大家一样”。在铁板一块的集体中个性遭压抑。我们的基本阶层丧失了认识权利乃至尊严,不想有独立性和积极性,永远需要别人来为他们做一切。我们政治革命的思想也是不自由

的、不结果实的、惰性的。作为一个定型阶层的俄罗斯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其精神是保守的而且对真正的自由不甚了了;他们接受机械平等思想要比接受自由快得多。有人觉得:俄罗斯注定要遭奴役而且没有通向自由生活的出路。可以想像:俄罗斯个性不仅在保守派那里没有出现,而且在革命者那里也没有出现,俄罗斯仍旧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集体的国度。但必须清楚:自古以来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只是自然进化的原始阶段的暂时现象,而不是精神的永恒现象。

怎样理解俄罗斯这种使命的矛盾性?怎样理解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命题具有同等正确性?这里,如同在各处我们谈论俄罗斯灵魂的自由和奴役问题,谈论朝圣云游和静止不动问题一样,我们碰到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神秘关系问题。这些深刻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性格中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没有统一起来。无限的自由变成了无限的奴役,永恒的漫游变成了永恒的停滞,因为男性气质的自由在俄罗斯没有深刻、内在地把握女性气质的民族自然力。男性气质因素永远需要从外而来,个性因素没有在俄罗斯人民自身中予以揭示。对异族的永恒依赖由此而来,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意味着:俄罗斯永远感觉到男性气质因素对自身是超验的,是从外附加的,而不是内在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俄罗斯以往所有男性气质的、解放的和定型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俄罗斯的,而是外国的、西欧的、法国的、德国的或古代希腊的。俄罗斯如果自己无力在存在中形成自己的自由,那就无力培养自己的个性。返回到原来的土壤,返回到本民族的自然力,就会轻而易举地在俄罗斯接受奴隶性格,走向静止,趋于反动。俄罗斯是小姑待嫁,她期待新郎从某个高处降临,但命中注定的人没有来,而是官僚来占有了她。在精神生活中占有她的,时而是马克思,时而是康德,时而是施泰纳,时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俄罗斯是如此独特的国度,是精神如

此辉煌的国度,她长时间与西欧处于沙文主义的关系之中。她没有向西欧学到她所需要的和优秀的东西,没有为了自身的拯救而了解欧洲文化,而是奴隶般地服从于西方或者在野蛮的民族主义反应中捣毁西方,否定其文化。阿波罗神,男性气质形式的神还没有进入狄奥尼索斯的俄罗斯之中。俄罗斯的狄奥尼索斯精神是野蛮的,而非希腊式的。在别的国家也可以找到许多矛盾性,但只有在俄罗斯正题变成了反题。从无政府主义中产生了官僚国家体制,从自由中产生了奴役,从超民族主义中产生了极端民族主义。这个封闭的圆圈中只有一条出路:在俄罗斯本身内部,在其精神深渊中揭示出男性气质的、个性的、定型的因素,控制原有的民族自然力,让男性气质的、灿灿生辉的认识内在地觉醒。而且,我相信,今天的世界大战将引俄罗斯走出这个封闭的圆圈,将唤起它的男子汉精神,向世界展示俄罗斯的男子汉形象,并且确定东欧和西欧应有的内在关系。

二

现在斯拉夫民族和德意志民族久已期待的世界争斗终于爆发了。日耳曼风格早已渗入俄罗斯核心之中,俄罗斯国家制度与俄罗斯文化已不知不觉地日耳曼化了,它控制了俄罗斯的身体与精神。现在日耳曼风格公开以战争形式进入斯拉夫世界。日耳曼民族是男性气质的,自信和勇敢的。日耳曼世界感觉到了斯拉夫民族的女性气质并认为:他应该占有这个民族和她的土地,只有他有力量来使这片土地成为文明。日耳曼风格早就派遣了自己的媒婆,他有自己的使者并感觉到俄罗斯注定是属于自己的。俄罗斯的整个彼得堡时期都处于德国人内在与外在的影响之下。俄罗斯人民几乎已经准备与此意见认同:只有德国人能管理他们并使他们文明化。为

了使俄罗斯认识自己,抖落自身的消极性,唤起自身的男子汉的力量并感觉到自己对于世界伟大事业的使命,就需要有全然超乎常规的世界惨祸,需要有出于骄傲和自高自大的日耳曼风格的疯狂。在同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大战中不能以斯拉夫的女性气质和驯服性与之对抗,需要在被日耳曼风格吞噬的威胁下揭示自身的男子汉形象。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世界的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较量,而更为深刻的是:这是精神的战争。是东方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为在世界上争取对多种精神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冲突与交流。在这场伟大的、真正的世界战争中俄罗斯不能不认识自己,但她的自我认识应成为她的自我净化。自我认识必须以自我批判和自我揭露为前提。自吹自擂从来都不是自我认识,它只是十足的糊涂。今天的德国就是一个完全丧失自我认识并且自吹自擂和自高自大而完全陷入蒙昧和奴役的榜样。男性气质的、闪闪发光的民族认识永远是批判性的,永远是从原有的蒙昧和奴役中解放出来,永远是对自身混沌自然力的控制。俄罗斯的自我认识首先应从原有民族自然力的压制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这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在对待自己俄罗斯土地的关系上应该是男子汉式的,是堂堂正正的。应该控制土地并安顿好她的混沌自然力,而不是在其中溶解,消极地献身于它。这同时意味着:人类的使命是控制自然,而不是让自然控制人类。俄罗斯的生活太自然化,人类生活化不足;太种族化,个性生活化不足。个性的、人类的因素迄今仍没有控制大地的无个性的自然力。俄罗斯将这种自古以来的种族生物学体验为自己自古以来的集体神秘主义,并且在一些自己思想的表达者身上看到了它对于西欧的优越性。俄罗斯大多数信奉的是种族肉欲的宗教,而不是精神的宗教。她将种族的、自然的集体主义与精神的、超自然的集体主义混为一谈了。但矛盾神秘的国度俄罗斯仍蕴藏着预言精神和对新生活与新发现的预感。

在这个对于俄罗斯认识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必须明确而勇敢地认识正觊觎我们的危险性。战争能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财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财富。它唤起了人民、民族统一的深刻情感,克服了内部的纷争与敌对,克服了党派的鸡毛蒜皮的算计,展示了俄罗斯形象,彰显了男子汉精神。战争揭穿生活的谎言,摒弃遮掩粉饰,拒绝虚伪的神圣。它是伟大的彰显者,但它也带来危险:俄罗斯可能成为虚假的民族主义和真正的德国沙文主义的俘虏;她可能醉心于统治世界的理想,这种理想精神并非是俄罗斯的,也是斯拉夫民族所陌生的。战争带来粗俗的危险性。俄罗斯首先应从对德国的仇恨中解脱出来,从对它的恶意与复仇的奴隶般情感中解脱出来,从对敌人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否定中解脱出来,这种否定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要相信这一切并不会到来,但闭眼不看这种可能性则又是不当的。俄罗斯民族自然力中有俘虏于、屈服于外物的永恒的危险性。俄罗斯只有从一切俘虏中,从一切外在的、非应当的、异己的东西的压制和奴役中彻底解放出来,并在自身中揭示出内在的男子汉气,揭示出内在的光明和雄伟的创造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复兴。战争应当把我们俄罗斯人从对西方的、不健康的、令人悲戚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她一直把它作为一种遥远的、外在的力量,时而对之寄予奇异的爱恋,时而又对之报以强烈的憎恨与恐惧。西欧和西方文化对于俄罗斯将成为内在的,俄罗斯成为彻底的欧洲的,而恰恰这时她将成为精神独特和精神独立的。欧洲将不再成为文化的垄断者。世界大战已经把世界的所有部分、所有民族强拉入这血腥的演变之中,应该在这血腥的苦难中诞生出全世界统一的坚定认识。文化将不再成为如此独特的欧洲的,而将成为世界的、普遍的,而俄罗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占有中介的位置,她是东西方的,她在人类的走向统一的进程中负有起伟大作用的使命。世界大战迫切地把我们引向俄罗斯救世主论问

题。

救世主意识不是民族意识，它与民族主义是深刻对立的，这是普世的意识。救世主意识在犹太民族的宗教意识中有自己的根，以色列体验到自己是上帝惟一的选民。救世主意识是上帝选民的意识，救世主应该在这一民族中出现，并且世界通过她而得到拯救。上帝选定的民族是各民族的拯救者，是惟一和命中注定具有救世使命的民族。所有其他民族是低等的，非选民的，这些民族是平凡的，没有神秘的命运。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目的，但只有一个民族会为救世的目的所选中。具有救世意识和使命的民族是惟一的，就像救世主是惟一的一样。救世主意识是世界的，超民族的，这点与罗马帝国的思想相类似，它也是普世的和超民族的，就像古犹太人的救世主论一样。犹太人这种符合其自身追求的世界救世主意识已为事实所证明，救世主在这个民族的核心中出现，虽然他遭到了他们的排斥。但在基督出现之后，古代犹太意义上的救世主论对基督教世界就变成不可能了。对于基督徒来说，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没有一个民族能成为基督教世界上帝的惟一选民。基督是为所有民族而来，所有民族在基督教认识的审判面前都有自己的命运和所有。基督教不允许民族的特殊性和民族的骄傲，谴责那种认为我的民族高于所有其他民族并且是惟一有信仰民族的意识。基督教是对人类的统一，全人类、全世界精神统一的彻底肯定。这点已为天主教所充分认识，即使是连接在有限的身体历史现象上(天主教)。救世主意识是先知的意识，救世主论的自我感觉是先知的自我感觉。其中有信仰生活的盐，这种盐是从犹太民族那里取来的。这种先知的救世主意识在基督教世界中并没有消失，但它会变化、更容。基督教世界中先知的救世主论是可能的，某个民族的独特宗教使命意识是可能的，通过这个民族将向全世界说出新的启示话语的信念是可能的。但基督教的救世

主论应该从一切非基督教的、一切民族的骄傲和自高自大中净化出来。一方面它要从犹太教救世主论的老路中走出,另一方面它又要避免新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基督教的救世主意识不能肯定这种观点:俄罗斯民族是惟一具有伟大宗教使命的,是惟一的基督教民族,她是为基督教命运和遭遇而被惟一选中的,而其他所有民族都是低贱的、非基督教的和丧失了使命的。在这种自高自大中没有任何基督教因素。在斯拉夫派关于西方腐败和他们中基督教生活缺乏的永恒曲调中没有任何基督教因素。这种基督教中的犹太教使我们从新约返回到旧约。基督教中的犹太教是潜在的危险,应该将其清除。而任何一种特殊的宗教民族主义、任何一种宗教民族的自高自大都是基督教中的犹太教。教会极端的民族化是基督教内部的犹太教,而在俄罗斯基督教中有许多的犹太教因素,许多的旧约因素。基督教的救世主意识也许只能是这样一种意识:在临近世界一体的时代,俄罗斯的使命是向世界说出自己的新话语,就像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曾经说出的那样。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民族应该揭示自己的精神趋向,表现自己的神启精神。斯拉夫民族正在接替那些已经发挥过作用但现已趋向衰落的民族,她是未来的民族。一切伟大的民族都要经过救世主意识。当一个民族的使命在于为世界完成某种伟大而崭新的事业的时候,该民族就进入精神高涨时期,救世主意识也同时产生。德国在19世纪初期就产生过这样的救世主意识,而现在,在德国救世主论终结的时候,在他的精神力量完全耗尽的时候,我们出场了。在基督教历史中并没有上帝惟一选中的民族,但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期会因伟大的使命,因启示的精神而被选中。在俄罗斯产生了这种历史时刻即将到来的预感,到时候她将被精神的伟大启示所召唤,到时候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在她之中产生。这不是犹太的救世主论。这种预感并不排除其他民族的伟大选择和命运,它只是基督教世界各民族所共

同创造的事业的继续和补充。这种俄罗斯救世主意识曾是混乱的，交织了异教的民族自然力并为犹太教的残余意识所歪曲。俄罗斯意识应该从这异教的和犹太教的俘获中净化和解放出来。而这意味着：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生活应从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斯拉夫派的死气沉沉的、冷酷肃杀的气氛中彻底地解放出来。斯拉夫派中也有自己的真理，它相对于西欧派来说永远是好的。真理会留下来，但在物质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虚伪和谎言、很多奴役、很多“自负的欺骗”和美化，它们钳制了精神生活。

俄罗斯不能把自己定义为东方，把自己与西方对立起来，俄罗斯应意识到自己是西方，是东西方，是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分裂者。弗·索洛维约夫从精神上终结了旧的斯拉夫主义，终结了它的虚伪的民族主义和特殊的东方主义。弗·索洛维约夫事业之后，应在认识中彻底地肯定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任何一种分立主义在本质上都是非基督教的。东方自然力在俄罗斯的独特统治永远是女性气质自然因素的奴隶，它有时以反动的、有时以革命的混乱统治而告终。俄罗斯自我确认为东方。俄罗斯是民族自负的和十分独特的，这意味着男性因素的不发达和不清楚，意味着人类的、个性的因素被自然力、民族与种族传统与风习的因素所奴役。在宗教意识中，这意味着有限的肉体的绝对化和神化，意味着满足于民族肉体的动物般的体温之中。俄罗斯永恒的诱惑和巨大的危险就在于此。斯拉夫人的女性气质使他们具有神秘的敏感，并能够倾听内在的声音，但女性气质自然力的特殊统治又妨碍他们去完成自己在世界中^①的使命。对于俄罗斯的救世主论来说需要的是男子汉精神。没有它就又将陷入俄罗斯大地的诱人的难以自拔的原始自然力之中。俄罗斯自然力自身也期待澄清和定型。但斯拉夫派

^① 在俄罗斯革命中我们看到罕见的东方因素的统治，它拒绝文明的标准并拒绝解除混乱。——作者注

的终结同时是西欧派的终结,是东方和西方对立本身的终结。在西欧派中有分立主义和分省主义,而没有普世精神。西欧派意味着对西方的一种不健康的、非男子汉气的态度,意味着一种不自由并不能感到自己对于西方而言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俄罗斯的自我认识不能是斯拉夫派的,也不能是西欧派的,因为这两种形式都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对于世界的生活和世界的作用而言还不完善和不成熟。在西方不可能产生西欧派,在那里不可能有把西方作为某种最高状态的理想。最高的状态不是西方,就像它不是东方一样,它没有任何地理的和物质的限制。世界大战应该克服俄罗斯作为特殊的东方,欧洲作为特殊的西方的存在状态。人类要从这种限制中走出来。俄罗斯要凭借确定的力量走向世界生活,但要发挥俄罗斯的世界作用,就首先要唤醒人的创造的积极性,并从消极性和弥散性中走出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重性中已经有了人的启示的预言,有了独特强烈的人类学意识。真正的俄罗斯救世主论首先必须使宗教生活、精神生活从被民族、国家因素的奴役中,从一切对物质的风习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俄罗斯应该经历个性的宗教解放。俄罗斯的救世主论首先应依靠俄罗斯的朝圣、漂泊和寻觅,依靠俄罗斯精神的不安份和不满足,依靠先知的俄罗斯,依靠那些不具有自己城市而追求未来城市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救世主论不能同日常生活的、怠惰守旧的俄罗斯,不能同因自己民族的肉欲而变得臃肿笨重的俄罗斯,不能同捍卫仪式崇拜的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不能同满足于自己的城市,满足于异教的城市而恐惧未来的城市的俄罗斯人联系在一起。

斯拉夫派和俄罗斯神秘主义者的一切特征是寻找上帝的城市未来的城市,期待耶稣的天国在大地上降临,渴望共同的拯救,共同的幸福,渴望处在启示录情绪之中。这种启示录的、神启的期待与那种以为俄罗斯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城市并且这个城市就是“神

圣罗斯”的感觉是相对立的。斯拉夫派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自满自足感觉中产生的,并且我们现在所有右翼的宗教民族思想体系也在这种感觉中产生。捍卫这种感觉的神甫们的宗教是与俄罗斯精神,与寻求未来真理的神启宗教精神相冲突的。俄罗斯的根本矛盾之一就在这里。如果说为正题作辩护的材料很多,俄罗斯是以保护宗教圣物而显优越的并以此作为自己宗教使命的国度;那么能证明反题的材料也不比之少,俄罗斯是以宗教的饥渴、精神的热望、先知的预感和期待而见长的国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俄罗斯的这种宗教二律悖反的化身。在他身上有两种面貌:一种趋向于捍卫、加强那冒充为真正存在的民族宗教风习,这是精神餍足的形象。另一种则是趋向于未来的城市的先知的形象,这是精神饥渴的形象。精神餍足与精神饥渴的矛盾、对抗就是俄罗斯的基本矛盾、对抗,俄罗斯的其他诸多矛盾都由此可得到解释。精神餍足是以自身消极地沉湎于女性气质的民族自然力之中的方式而得到的。这还不是上帝的食物的饱和,而仍然是自然主义的餍足。精神的饥渴、对自然主义的民族的食物的不满足,是个性的男性气质因素解放的标志。这就是我们在民族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看到的矛盾。我们在俄罗斯民主生活中总能看到这两种形象。精神的餍足,对旧有东西的保护,对基督教的风习化的外在仪式的理解,这是民族宗教生活的一种形象;精神的饥渴、先知的预感,在东正教的另一顶峰——我们的小教派和分裂教派所达到的神秘深度,这是民族宗教生活的另一种形象。俄罗斯神秘主义、俄罗斯救世主论与俄罗斯的第二种形象紧密相连,与她的精神饥渴,与对上帝真理像在天国一样降临大地的渴望是紧密相连的。启示录情绪是俄罗斯神秘主义与德国神秘主义的最深刻区别,德国的神秘主义只是陷入精神的深渊之中,他从来不追求上帝的城市,不追求终极,不追求世界的改变。而俄罗斯的启示录情绪有一种趋于消极、

期待、女性气的强烈倾向,俄罗斯精神的特别之处就表现在这里。神启的俄罗斯灵魂感到自身浸透了神秘主义的汁液。这在民族生活中表现为对“敌基督”的恐惧。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真正民族宗教的体验渗透在我们的文化宗教哲学潮流之中,不过已采取了反映的、过分模拟的、艺术的形式。甚至作为神秘主义情绪忠实标志的——这种宗教的恐惧与害怕的美学形式已经形成。在此仍然没有那种男子汉的、积极的、创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是俄罗斯为完成她那命定的世界任务所首先需要的。先知的俄罗斯应该从期待走向创造,从强烈的恐惧走向精神的勇敢。俄罗斯的使命不是富足安康,不是身体和精神的完好,不是巩固世界旧的机体。俄罗斯没有创造中等文化的才干,这是她深刻地异于西方国家的地方,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其落后性上,而且也表现在其精神上。

俄罗斯精神的秘密就在这里。这种精神在一切之中追求最后的、最终的、绝对的东西,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爱。但在自然历史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相对的和平常的东西,因此俄罗斯对绝对自由的渴望在实践中经常被相对的、平常的东西所奴役,俄罗斯对绝对爱的渴望走向了敌对和仇恨。^①在所有相对的平常的领域中俄罗斯的无力与无能是典型的。而所有的文化社会历史都处于平常和相对的状态中,她不是绝对与终极的。因为上帝的王国是绝对的终极的王国,所以俄罗斯人就轻易地把所有相对的、中等王国的权力交给了魔鬼。这点是很具俄罗斯特征的。俄罗斯人难以为自己争取到相对的社会自由,不仅是由于俄罗斯人天性中的消极性与忍耐性,而且由于俄罗斯精神渴望的是绝对的上帝的自由。因此俄罗斯难以创造相对的文化,这种文化永远是倒数第二的事业,而不是最后的事业。俄罗斯长期处于平常的与相对的东西的奴役

^① 俄罗斯革命明显地表现出了俄罗斯绝对的危险性。——作者注

之中，而这恰恰证明：他们在终极和绝对之中是自由的。斯拉夫派的深刻主题之一在这里被掩盖了。斯拉夫派想给人民以宗教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而让他们将所有其他的生活都献给无限控制人民的权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宣告了闻所未闻的精神的自由，在基督中的绝对宗教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又准备不仅驯服地和解，而且捍卫社会的奴役。此外，这种俄罗斯特点也表现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身上，他们在任何一种有限的社会生活中都要求绝对的自由但却不具有创造自由的社会生活的能力。这里，我们从一个新的方面接近了俄罗斯的基本矛盾。这里仍然存在俄罗斯民族自然力与俄罗斯精神核心之中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因素的相互隔绝。在一切之中追求绝对的俄罗斯精神没有勇敢地控制相对的、中等的领域，而把自身交给了外在权力。这样，在平常的文化中它总是准备把自由交给德意志权力、德意志哲学与科学。在国家体制之中也是平常的、相对的。俄罗斯精神想要绝对中的神圣王国而又准备与相对的兽性的王国和解。因此神圣的俄罗斯永远有自己相反的兽性的一面。俄罗斯好像只是想成为天使的和兽性的，而不能充分地揭示自身中人的因素。天使的神圣与兽性的丑恶，这就是俄罗斯人民永恒的钟摆，这是中等的西方民族所不知晓的。俄罗斯人民陶醉于神圣之中，同样也陶醉于罪孽与丑恶之中。温顺的、不敢过于张狂的罪孽，这也是俄罗斯宗教的特点。在这种罪孽中他们感觉自己进入了温暖的民族肉欲、低洼大地的自然力的怀抱。俄罗斯精神中先知的救世主论本身就是这样，对绝对的渴望，对变容的渴望却变成了一种奴役。我试图说明俄罗斯的所有矛盾并使之走向统一。这是一条自我认识之路，而俄罗斯为了揭示她的伟大精神潜力，为了实现她的世界任务是需要这种认识的。

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大地？俄罗斯人应该怎样对待俄罗斯

大地呢?这就是我们的难题。故乡大地的形象不仅是母亲的形象,也是未婚妻和妻子的形象。人以自己成熟、辉煌的男子汉气而使她富有,故乡的大地也是孩子的形象。人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大地,在她的所有矛盾中爱她,连同她的罪孽与缺陷。没有对自己大地的爱,人就无力创造什么,就无力把握大地。没有大地的自然力,男子汉精神是无力的。但人对大地的爱不是受大地的奴役,不是消极地沉溺、消融于她的自然力之中。人对大地的爱应该是男性气质的。男性气质的爱是从自然主义的依赖、从原始集体主义的陷溺中走出的出口。自然经济不仅过多地控制了俄罗斯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控制了她的精神生活。俄罗斯人民要在痛苦中从这一自然经济阶段走出,这一过程是痛苦而艰难的。俄罗斯叛教者和漂泊者摆脱了对这种被视为最高状态的集体自然主义的依赖。这种摆脱不是脱离故土,并且俄罗斯叛教者与漂泊者仍是俄罗斯的,仍是典型民族的。我们对饱经忧患与牺牲的俄罗斯大地的爱超过了任何时代,超过了任何关系与任何思想体系建构。俄罗斯灵魂不是资产阶级的灵魂,而是不屈服于金钱崇拜的灵魂,凭这点就足以无限地爱她。俄罗斯的珍贵与可爱就在于其自身奇异的矛盾,谜一样的二律悖反,神秘的自然力。世界大战开始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俄罗斯自然力要求成熟的、闪闪发光的逻各斯。男子汉性格和在西方由骑士精神培养出来的个人坚韧性的缺乏,这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与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危险的缺陷。俄罗斯人对故土的爱本身采取了妨碍男子汉个性精神发展的形式。为了这种爱、为了投入母亲的怀抱俄罗斯拒绝了骑士精神。俄罗斯精神被包裹在民族母亲的肉体怀抱之中,他沉溺在温暖而湿润的肉体之中。如此著名的俄罗斯忠诚就与这种温暖、湿润相连;其中有很多的肉欲,而精神很少。但肉体 and 血液并不能继承永恒,也许只有俄罗斯精神能成为永恒。俄罗斯精神也许只能以对集体体温中的生命的勇敢

的牺牲来揭示。俄罗斯秘密只能靠摆脱蒙昧自然力奴役的行动而得到开启。在世界大战的摧枯拉朽的火焰中将烧尽许多东西,将把世界和人的腐朽物质外衣烧成灰烬。而这时候俄罗斯新生活的复兴只能走男子汉的、积极的和创造性的精神道路,只能依靠在人和人民心中揭示基督的行动,而不能不依靠永恒缓慢驯服的自然主义的种族自然力。这是精神之火对于肉体的温暖与潮湿的胜利。俄罗斯宗教性格力量在于:永远追求绝对与终极。在人道主义和其他种种非宗教的思想形式中,人的因素不能得到揭示。人道主义在西方已经完成使命,成了昨日黄花,走向了危机,从这里很难找到西方人类的出路。俄罗斯不能重复已经过时的西方人道主义。在俄罗斯,人的发现也许只能是宗教的启示,只能是内在的人、而非外在的人的揭示。基督是内在的。俄罗斯的绝对精神是这样的:其中的一切应该发自内心,而非来自外表。斯拉夫人的使命是这样的:其中可能有的只能是信仰,而不能证明。俄罗斯人民最需要的是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生活中唤醒宗教的男性气质。他应该是自己大地的主人。俄罗斯人民的男性气质不应该像德意志人那样与女性气质相脱节、相分离。她独特命运的秘密在于:具有禁欲主义灵魂的俄罗斯应该成为伟大而强盛的国家。她将以力量和伟大、而非以柔弱和小巧来战胜统治这个世界的诱惑。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巨大而有力的牺牲,只有自由的贬抑才能拯救与补赎。俄罗斯民族应该充分容纳这种二律悖反于自身:俄罗斯人民在精神上和使命上是超国家与超民族的,其理想不是这可爱的“世界”与“在世界之中”,赋予她强大的民族国家是为了让她能有力而非无力地作出自由的牺牲与放弃。俄罗斯存在的二律悖反应该由俄罗斯灵魂内在承担,她将作出勇敢的牺牲并在这种牺牲中经历自己神秘的命运。男子汉精神在俄罗斯的揭示不能是中等的西方文化的嫁接。俄罗斯文化也许只能是终极的,只能是文化界限的出口。男子汉精神潜

在地蕴藏在俄罗斯预言里,俄罗斯的朝圣云游和俄罗斯的真理探寻之中,并且它与俄罗斯大地的女性气质内在相连。

注:本文摘自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命运:战争心理与民族心理体验》一书第1章,第1~29页,莫斯科,1918年。文章1915年首次发表于莫斯科。